

大象

学术

译丛

[奥] 阿方斯·多普施 (Alfons Dopsch) 著

肖超译

欧洲文明的经济 与社会基础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Foundations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上)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大象学术译丛

欧洲文明的经济与 社会基础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Foundations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奥] 阿方斯·多普施(Alfons Dopsch) 著

肖 超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洲文明的经济与社会基础 / (奥) 多普施
(Dopsch, A.) 著; 肖超译. —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5347-6380-9

I. ①欧… II. ①多… ②肖… III. ①西欧—历史—
研究 IV. ①K560.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17599 号

大象学术译丛

欧洲文明的经济与社会基础

[奥] 阿方斯·多普施 著

肖 超 译

出 版 人 王刘纯

责任编辑 刘东蓬

特约编辑 王嘉黎

责任校对 钟 骄

书籍设计 付锁锁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开元路 16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5597936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新乡市电科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43

字 数 603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98.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新乡市荣校路 195 号

邮政编码 453003 电话 0373-3713559 3712457

大象学术译丛弁言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西方学术界对学术史、科学史、考古史、宗教史、性别史、哲学史、艺术史、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特别繁荣;研究的方法、手段、内容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一切对我们相关学科都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但囿于种种原因,国内人文社会科学各科的发展并不平衡,也缺少全面且系统的学术出版,不同学科的读者出于深化各自专业研究的需要,对各类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渴求也越来越迫切,需求量也越来越大。近年来,我们与国外学术界的交往日渐增强,能够翻译各类专业书籍的译者队伍也日益扩大。为此,我们组织翻译出版一套“大象学术译丛”,进一步繁荣我们的学术事业:一来可以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具体的研究途径;二来为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三来也满足不同学科读者的实际阅读需要。

“大象学术译丛”以整理西学经典著作为主,但并不忽略西方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目的是为中国学术界奉献一套国内一流人文社会科学译丛。我们既定的编辑出版方针是“定评的著作,合适的译者”,以期得到时间的检验。在此,我们恳请各位专家学者,为中国学术研究长远发展和学术进步计,能抽出宝贵的时间鼎力襄助;同时,我们也希望本译丛的刊行,能为推动我国学术研究和学术薪火的绵延传承略尽微薄之力。

编 者

目 录

中译者序

1

英文版前言

1

第一章

当代思潮对历史研究的影响

1

第二章

所谓的“最早”期(恺撒和塔西佗)

45

第三章

大迁徙时代罗马人与日耳曼人

74

第四章

5—6 世纪时日耳曼人对土地的占领

147

第五章

罗马晚期与中世纪早期的土地划分与农业经济

210

第六章**政治结构**

265

第七章**社会的重构**

327

第八章**教会**

389

第九章**封建主义的兴起**

454

第十章**城镇生活的发展**

486

第十一章**制造业与贸易**

526

第十二章**通货与货币经济**

576

第十三章**回顾与总结**

619

索引

630

缩略语

662

中译者序

阿方斯·多普施(Alfons Dopsch),1868年6月14日出生于奥地利帝国波西米亚(Bohemia)一个名为罗布西茨(Lobositz)的小镇上,该地区即如今捷克共和国的洛沃西采(Lovosice)。多普施于1886年开始在维也纳大学攻读历史学,后于1890年获得博士学位,并在1898年成为维也纳大学的史学教授。在那里,他一直执教到1937年。1953年,多普施逝世于维也纳。^[1]

多普施平生治学,主要专注于对西欧中世纪的研究。这本《欧洲文明的经济与社会基础》,正是奠定他在该领域内权威地位的作品,同时也是这位博学者至为重要的著述之一。该书最初以德文发表于1918年到1920年间,后又于1923年到1924年间再版。凭借该著作中对于恺撒至查理曼时期欧洲文明所做的“出色研究”,^[2]多普施的诸多创新性观点逐渐从德语知识圈扩散出去,在整个西方学界内得到了广泛认同。1937年,在英国著名中世纪专家艾琳·鲍尔(Eileen Power)^[3]的建议下,该书的英文缩减版得以发表。^[4]当时,就有美国学者对该书给予相当高的评价:“多普施毫无疑问给我们提供了最

[1] 关于阿方斯·多普施较详细的个人与著述简介,可以参阅:*Handbook of Medieval Studies: Terms-Methods-Trends*, edited by Albrecht Classen, 3 Volumes. Berlin and New York: De Gruyter, 2010, pp. 2267-2271. 本书脚注皆为中译者所加。——中译者

[2] D. Clark Hyde, “Review: [untitled], Reviewed work(s):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Foundations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by Alfons Dopsch”,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Published by: Souther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 4, No. 4, (Apr., 1938), p. 481.

[3] 艾琳·鲍尔(1889—1940),英国近代重要的经济历史学家与中世纪研究专家。曾于1931年担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教授,后又于1938年出任剑桥大学经济史学教授。

[4] Alfons Dopsch,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Foundations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translated by M. G. Beard and Nadine Marshall.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first published in 1937, second impression in 1953, xi.

深入、最令人信服的作品,它展现了许多全新的观点。”^[1]而事实上,这些“全新的观点”,因其史料之广博以及论证之严谨,在该书付梓后不久就已成为其所涉领域内的主流权威理念。正如研究中世纪欧洲经济史的剑桥大学教授迈克尔·波斯坦爵士^[2]于其时所指出的:“多普施的绝大部分观点,都被学者们接纳到了公认理论的主要架构之中。”^[3]

作为一部否定过往“经典”的经典,多普施的《欧洲文明的经济与社会基础》展现并且也迎合了当时西方思想界那股力量巨大的思潮,在这股潮流面前,以往的各种权威经典理论都被深刻地质疑。而具体到多普施的研究视域内,先前所有那些关于早期中世纪日耳曼与罗马之间关系的史学理论,尤其是那种长期以来被人们奉为圭臬的,认为罗马文明曾经被日耳曼蛮族在历史进程中彻底抹去的观点,都被彻底地反驳了。迥异于早前的史家,多普施没有再将那段时期试图阐释为某个“黑暗时代”,相反,他向读者们勾勒出一幅更有活力并且更具动力与创造力的历史图像,使得读者们开始对这段历史的面貌形成另外一种认识。这就像当时的学者总结所言:“我们不再认为古典世界和中世纪之间存在任何明显的断层。古典世界的没落是渐进的,而且有很大一部分遗产都被带到了中世纪文化之中。”^[4]

尽管多普施对过去权威理论的反驳十分激烈,但他并没有试图仅仅通过否定来强加给读者某种肯定。当他与过往的经典决裂时,他已经认识到了其思想前辈们的根本性局限。那就是在处理中世纪早期罗马与日耳曼之关系

[1] Harry Elmer Barnes, “Review: [untitled], Reviewed work(s):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Foundations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by Alfons Dopsc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Published by: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Vol. 3, No. 2, (Apr., 1938), p. 300.

[2] 迈克尔·穆瓦塞·波斯坦爵士(Sir Michael Moisse Postan, 1898—1981),英国著名的中世纪研究专家,尤以对中世纪欧洲经济史的杰出研究而知名,曾先后任教于伦敦大学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于1937年成为剑桥大学教授。

[3] M. Postan, “Review: Rome and the Barbarians, Reviewed work(s):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Foundations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by Alfons Dopsch”,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8, No. 2, (May, 1938). Published by: Blackwell Publishing on behalf of the Economic History Society, p. 188.

[4] Harry Elmer Barnes, “Review: [untitled], Reviewed work(s):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Foundations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by Alfons Dopsch”, p. 300.

这一“最古老的历史问题”^{〔1〕}时,早期那些人文主义者,包括被视为文化史奠基人的孟德斯鸠与伏尔泰,以及18世纪时奉行“自由、平等”理论的学者,连同19世纪的社会学家们,都有着一个相同而致命的局限性,即他们都“将各自的理想投射回到历史的过往之中,并试图去证明这些理想曾经在过去有着某种真实的存在”。^{〔2〕}此外,多普施还敏锐地把握住了他所处时代中的那些能够更为科学地认识历史的“新的途径”^{〔3〕}——现代语言学的新进展、罗马晚期文物发掘的考古成果以及现代纸莎草学的研究成果。拜这些新的理论路径所赐,多普施才有可能回归到更加原始的材料,从而可以更为自信地挣脱那些古老权威理论的束缚。

也正是在这种“新的材料可资使用,并且旨趣与重点皆得以改变”^{〔4〕}的背景下,多普施几乎在所有的方面,都展开了对过往权威的清算与批驳。他揭示了曾经被奉为金科玉律般的恺撒与塔西佗等罗马写作者的偏颇立场;指明在大迁徙时期日耳曼蛮族就已经相当罗马化,他们对罗马帝国的入侵更多地表现为和平渗透而不是野蛮征伐;驳斥了早期理论家们建构的那种认为日耳曼人没有任何可耕地私有制的“马尔克(Mark)”共同体理论;论证了在日耳曼兴起与罗马消亡的过程中,旧有政治结构以及社会结构都没有被完全摧毁,蛮族与帝国之间更多的是延续与融合,而不是断裂与对斥;阐明了基督教会 在罗马向日耳曼转换进程中的继承性身份,而并非两个彼此割裂的文化之间的中介;批判了那种认为是加洛林王朝各种军事紧急情况才使得封建主义快速兴起的观念,论证出不管是骑兵制度抑或是专业军队,皆系比查理曼要更为古老的事物;而且区别于大多数历史学家对查理曼时代的称颂,多普施更看重梅罗文加时代,更强调5、6世纪时罗马与日耳曼之间文化融汇对于欧洲中世纪的意义,而加洛林时代中很多被视为“复兴”的全新创造,也就因此被

〔1〕 Alfons Dopsch,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Foundations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p. 1.

〔2〕 Alfons Dopsch,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Foundations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p. 27.

〔3〕 Alfons Dopsch,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Foundations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p. 28.

〔4〕 D. Clark Hyde, “Review: [untitled], Reviewed work(s):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Foundations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by Alfons Dopsch”, p. 479.

解释为“一些在文化发展中从未曾遗失过的事物”；^{〔1〕}并阐明了早期中世纪欧洲的城镇生活虽然颇受冲击但绝未消亡隐匿,制造业与贸易尽管屡遭压制却断非戛然而止,其间钱币流通仍然盛行,货币经济依旧繁荣。

一言以蔽之,在阿方斯·多普施看来,“日耳曼人并不是作为文化的敌人来行事的,他们并没有摧毁或者废弃罗马文化;相反,他们保留并且发展了罗马文化……罗马世界是被日耳曼人从内部逐渐侵占的,其侵占方式乃是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和平渗透。在此过程中,日耳曼人吸收了罗马文化,甚至在很大的程度上还接手了罗马的行政统治。因此,罗马政治影响力的废除,只是一个长期变化过程的最终结果”。^{〔2〕}而在这样的核心理念指引下,《欧洲文明的经济与社会基础》也就向我们展现出罗马与日耳曼,这两个向来被认为彼此水火对立的世界,是如何经过缓慢的、各种不同经济与社会元素的延接与熔合,最终浇铸出一个单一的西方欧洲文明的。

当然,如果说“本书唯一的缺陷,就在于未对高卢人于早期中世纪文明发展之贡献给予适当认可”,^{〔3〕}那么未免有些过度地维护这本宏博著述。实际上,当多普施断言其所掌握的那些新标准“将把法律记录对于这一段早期历史的重要性降为第二等级”^{〔4〕}时,他那种极力标举考古物质材料而贬斥文书思想资料的倾向,也随即招致了其他学者的严肃批评。^{〔5〕}而由该著作本身宏大主题所决定的涉猎广博,也多少会使得读者们很自然地“去反对作者那种想要证明过多东西的欲望”。^{〔6〕}但另一方面,真正使我们折服的,恰恰也正是

〔1〕 Alfons Dopsch,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Foundations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p. 390.

〔2〕 Alfons Dopsch,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Foundations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p. 386.

〔3〕 Harry Elmer Barnes, “Review: [untitled], Reviewed work(s):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Foundations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by Alfons Dopsch”, p. 300.

〔4〕 Alfons Dopsch,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Foundations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p. 386.

〔5〕 此处可以参阅牛津大学史学教授乔利夫(J. E. A. Jolliffe)于1938年在《英国历史评论》(*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中对《欧洲文明的经济与社会基础》所撰写的长篇书评,其中较为详尽地检讨了多普施在此方面的缺陷。参阅:J. E. A. Jolliffe, “Review: [untitled], Reviewed work(s):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Foundations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by Alfons Dopsch”,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53, No. 210, (Apr., 1938).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77–283.

〔6〕 M. Postan, “Review: Rome and the Barbarians, Reviewed work(s):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Foundations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by Alfons Dopsch”, p. 188.

多普施教授在该著作中,将如此众多而庞杂的富有个体独特性与地方区域性的材料,综合为某种具有普遍性质并且涵盖整个欧洲文明的理论,并在此过程中展现出深邃的论证能力,以及高超的叙述技巧。

本中译本根据德语版(第二版)的精简英译本翻译而成,该英译本由多普施的同事厄纳·帕策尔特(Erna Patzelt)教授加以删节,英译为M. G. 贝尔(M. G. Bear)与纳丁·马歇尔(Nadine Marshall)。这本精简英译本曾被同时代学者赞誉为“清晰、流畅并且常常是生动的”。^[1]

最后,谨向袁茂红女士在翻译中所给予的帮助致以深挚感谢。

肖 超

2012年12月6日于复旦大学

[1] T. F. T. Plucknett, “Review: [untitled], Reviewed work(s):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Foundations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by Alfons Dopsch”, *Economica*, New Series, Vol. 5, No. 19, (Aug., 1938), Published by: Blackwell Publishing on behalf of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Suntory and Toyota International Centres for Economics and Related Disciplines, p. 357.

英文版前言

此书是我本人于 1923—1924 年在维也纳所出版的德语版 *Wirtschaftliche und Soziale Grundlagen der Europäischen Kulturentwicklung* (第二版) 的精简英译版。

首先加以删节的,是本书探讨的主题涉及的某些较古老历史理论的相关内容;其次则精简掉了就对立观点所展开的讨论以及对经调研所得出材料的评述。另在文中不少地方,对地名起源所做的调查,连同举例论述中所举的某些例证,也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删减。而那些与英格兰特别相关的段落,也在本版本中予以了减省,因为在诸多英国研究者的著作中,读者能够找到更为详尽的基于此类材料所进行的相关阐述。故而在我这本著作的英文版中,更着意于欧洲大陆所盛行的那些情况。如果读者们希望在所给出的这些精简章节之外,能够得到更加详尽完整的阐述,那么可以参考文中相关的脚注(在此中译本中改为尾注——中译者),它们指明了这些内容在德语版中的对应段落。

而我必须承认,如果凭借着这本英译本,我的这些历史研究成果得以在英语世界中播散开来,那将是我莫大的荣幸。

在这里,我最先要特别致谢的是艾琳·鲍尔教授,她是本书英译本的发起者,并且在翻译过程中,她自始至终都提供了专业的建议以及对本项目的支持。随后要由衷感谢的是本书的翻译者贝尔小姐与纳丁·马歇尔夫人。并且也感谢出版商为本书设计了如此让人欣喜的封面。而对于我的同事厄纳·帕策尔特教授,我在此要再次地深表感激,因为她承担了精简德语版的这项艰巨任务——这既需要精简者非常熟悉该主题,还需要精简者对于本书的总体观念有着共鸣性的理解。最后,我还要特别感谢丽琴达·佩恩

(Richenda Payne)女士,正是她非常辛苦地核查了各处脚注,并主持了本书的整个出版过程。

阿方斯·多普施

1937 年于维也纳

第一章

当代思潮对历史研究的影响

在被称为“中世纪初期”的那段时期中,日耳曼人与罗马人,以及日耳曼人与罗马文明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这个问题可谓是最古老的史学问题之一。只要历史这门学科存在,那么史学家们就无法回避这一问题,而且他们必须有其明确的立场。然而,无论史学家们关于该问题的看法在细节上是如何地不同,他们的基本观点却一直以来都是相同的。尽管该基本观点偶尔也会遭遇某些挑战,但是在最近期的历史研究之中,它依然有着深远的影响。该基本观点就是:“日耳曼蛮族”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文明的敌人,正是他们侵入了旧的世界,并导致旧世界的衰落与毁灭。人们通常以为,当时已经存在的罗马行政当局,与新来者那尚处胚芽状态的政治发展之间,有着水火不相容的对立。也正是此种彼此间所固有之敌意,导致了古罗马的灭亡,以及对其无数财宝的大肆掳掠。许多著作都认为,这段惊人的毁灭时期在世界历史中为时甚短,有的甚至认为都不会超过一个世纪(大约自 350 年至 450 年),其起因则是大迁徙(英文为 the great migrations,德语为 *Völkerwanderung*)。而对于罗马体制向日耳曼体制的这一伟大转变,这些作品充其量将之描述为:在这个转变中不存在任何的中间过渡阶段,“蛮族”日耳曼人是与古老文明在其发展高点相同时并肩出现的,并且日耳曼人通过罗马教会的扩张,也仅仅只是逐渐吸收了古罗马文化中的部分要素而已。即便是卡尔·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也持有这种观点。他于 1898 年写道:“因此,该地区呈现出某种双重的表象,一边是罗马官员与商人们精致的奢华,另一边则是本地蛮族人群可悲的蛮荒,这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和谐的融合。”¹

尽管迪特里希·舍费尔(Dietrich Schäfer)将欧洲文明的兴起归功于那些人们通常以为的来源——罗马帝国、基督教以及日耳曼的民族性格,²但同时也认为“一种在新基础之上的发展”于5世纪时的日耳曼国家中兴起,然后一个全新世界随之而至,将过往的希腊-罗马世界取而代之。“这个新世界的崛起不可避免地需要从罗马人那里借用一些细节”,³尽管如此,中世纪的国家仍然是“一个日耳曼民族的创造,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都在笨手笨脚地蹒跚前行,而且它所具有的影响无论就内部还是就外部而言,都无法与罗马帝国这个庞然大物相提并论。但在那些断壁残垣之上,一颗新的种子开始破土而出”。日耳曼精神的独立自主在舍费尔看来是毫无疑问的。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基础很快就改弦易辙地去适应了日耳曼民族的性格,从而能够向前发展,可是古罗马文明则随风而逝,并且被遗忘了数个世纪。⁴因此,关于日耳曼对罗马的征服,舍费尔所谈论的也是“倒退的一步”,是“蛮族对于罗马文化的摧毁”。

这种关于欧洲文化起源的基本理论是如何形成的呢?以笔者之见,它是伴随着15世纪中期那场伟大的智识运动而成长起来的。如果我们没有忘记这一历史渊源,那么该理论也就易于理解了。在意大利,关于日耳曼征服罗马的这个重大问题,古典文化的文艺复兴运动不自觉地对之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愫。研究者们对古代世界研究与赞赏得愈多,他们将古罗马的衰亡当作民族灾难的感觉也就愈强。那些古代世界的钦佩者,用他们的想象为其涂抹出了一幅完美得让人不可思议的图画,这也使得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些罗马帝国的征服者就应该是些粗俗与暴戾的野蛮人了。尤其当这幅图画并不是以征服时期(5世纪)的种种社会状况为基础,而是以罗马文学与艺术的黄金岁月为背景时,我们就更容易理解它为何要被如此来描摹了。人们拜读恺撒和塔西佗的作品,并借用他们的术语“蛮族人(*barbari*)”^[1]来称呼日耳曼人,不过其含义与原作者当时所意指的已是大相径庭。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

[1] 中译本依照英译本的做法,对原书中涉及的拉丁语、希腊语、德语、法语等词汇与语句均予以保留,其中大部分也给出了中译以供读者参考。

文主义者看来,日耳曼人,作为伟大罗马文明的局外人,是文明的敌对者以及摧毁者。这些人文主义者不仅没有注意到自己是何等地自欺欺人,而且也没有意识到这种观点严重地违背了那些罗马作者的本意。就塔西佗而言,他对这些“野蛮人”有着较高的道德评价,甚至对他们赞赏有加。他将日耳曼人的种种风俗习惯,对比当时罗马行政当局的腐朽及其古典文化的惊人堕落,并通过这种对比得出了某种隐含的道德评判。

新近复苏的那种对古典文化的兴趣,使得人们发现了很多优秀的艺术作品,而这些作品越是杰出,日耳曼征服者对于罗马文明的敌意在人们眼中就显得越是深重。这些南方人的狂热转眼便引发几近痴迷的夸大,他们那过于敏感的凭空想象,使得从古典世界到日耳曼世界的转变只能被设想为一场巨大的灾难,一次古罗马世界的轰然坍塌。这些人还相信,在古罗马坍塌之前,它都未曾受过任何的触犯。他们对历史进程的延续性没有丝毫的概念。而日耳曼人,或者按照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称呼:哥特人(Goths)就成了导致罗马世界覆灭的罪魁祸首。在文艺复兴的新古典主义艺术家看来,横亘在他们与他们所尊崇的偶像之间的所有一切,都是“哥特式的野蛮”。这种观点也许在费拉莱特斯(Filaretos)那里有最苛刻的表达,他在1450年时大声疾呼道:“诅咒那些发明这种拙劣哥特式建筑的人,只有一个野蛮民族才会将它带到意大利来。”⁵

随后,意大利人的人文主义思潮越过阿尔卑斯山,在北部欧洲也同样地激起了人们对于古典文化的狂热。毫无疑问,那里也马上涌现出了反对意大利人那种极端立场的民族情绪,这种情绪在德国尤为明显,它催生了对日耳曼过往历史的积极研究。⁶但是我们必须牢记的是,即便是德国的人文主义者们,也相信罗马帝国的衰亡是一场灾难,并且日耳曼人要对此负责。比亚图斯·雷纳努斯(Beatus Rhenanus)也许是第一个较好地理解了日耳曼人与罗马人之间关系的人,但即使是他,也为那备受尊崇的罗马帝国之灰飞烟灭而深深惋惜。同样地,在他眼里,日耳曼人是掠夺者,用现代的话来理解就是“野蛮人(barbarians)”,也即“原始人(savages)”。的确,尽管雷纳努斯确实赞扬过,日耳曼人所陶冶出的高度自由是他们的一笔宝贵财富,但他甚至将法兰

克人也视为罗马帝国的首要破坏者。他认为法兰克人将城镇夷为平地,并奴役了他们所征服的那些罗马行省,这种做法与之前阿提拉手下匈奴人(Huns of Attila)^[1]的行径并无两样。⁷可以说,这些德国人文主义者对于古典文化过于尊崇,所接触的相关材料也过于片面,这使得他们无法正确地理解在中世纪早期新兴国家的发展进程中,日耳曼文化究竟承担了怎样一种真实而独立的角色。

人文主义过往的这种将日耳曼征服罗马视为灾难的理论,在很长时间里都在知识界处于主导地位,并且也是后来诸多理论得以构建的基本前提。随后的历史研究中所出现的专门领域,尤其是文化史(*kulturgeschichte*)的研究,更使该理论得以延续长存。因为尽管17世纪的德国迎来了历史学知识的巨大进步,但却是在与该理论截然不同的方向上所取得的进步。德国的政治机构、地方主义以及王权专制所带来的种种巨大动力,同样也对历史阐释与史学研究造成了影响;⁸此外,虽然人们已然拉开创建伟大新型国家的历史帷幕,历史学家们的研究却再一次地转向了更为笼统的主题,此后18世纪的法国启蒙时期思想又使得人文主义者的“灾难”理论推陈出新。比如布兰维里埃伯爵(Count Boulainvilliers)就给法兰克文化一个相当低的评价,而他之所以如此,是出于如下一种政治成见,即他认为法国的贵族是由高卢的法兰克征服者们转变而来,当时的国民阶层则由被征服的罗马人所构成。根据这种观点,法兰克人只是个居无定所、财无恒产的游牧民族,他们固定的土地资产只是在克洛维(Clovis)征服罗马人之后才出现。⁹而博学的杜布瓦神父(Abbé Dubois)则反驳了上述观点,指出日耳曼人与罗马人之间曾经有过和平的合作关系,并断言日耳曼人的到来乃是作为罗马人的盟友而非征服者,他们并未改变原有的罗马体系,至于高卢人的被奴役状况,最早也是要到9世纪时才由贵族阶层的兴起所造成。¹⁰然而,杜布瓦的这种反驳几乎毫无效果。孟德斯鸠和伏尔泰被人们认为是——这种认为并不十分正确——文化史的奠基人,他

[1] Huns 是否就是我国所言的匈奴人尚无定论,故此处音译为“匈奴人”,阿提拉是5世纪时匈奴人的王,曾率领匈奴人掳掠欧洲,人称“上帝之鞭”。